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林总主编

中外图书交流史

A CHINESE-FOREIGN EXCHANGE HISTORY OF BOOKS

● 彭斐章 主编

圖書
Books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 季羨林总主编

中外图书交流史

A CHINESE-FOREIGN EXCHANGE HISTORY OF BOOKS

● 彭斐章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中外图书交流史

主编 彭斐章

副主编 谢灼华

责任编辑:刘清华 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1.25 字数:300000

1998年6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1—2000

ISBN 7—5355—2456—7/G·2451

定价:19.3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论文中，在学术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都提到了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只要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试想，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说文化只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产品，即使不是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至少也含有民族歧视的因素，是与历史事实相违的。当人类初成人类时，当由狩猎者变为采集者时，为了生存，人类就会开始交流经验。哪一种动物能吃，好吃；哪种植物能吃，好吃，这样的经验都需要交流。范围一扩大，组成了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交流，就成了逐渐扩大的文化交流的滥觞。这种交流，对人类的生存与繁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决不可缺少的。事实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吗？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交流的范围日益扩大。物质方面固然可以交流，精神方面何独不然？宗教信仰可以交流，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等的交流也屡见不鲜。至于哲学、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这些交流所起的作用，不管是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的，还是隐而不彰，难以感觉到的，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列举，用不着更多的例证。

到了今天，人类已经处在 20 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不多几年，一个新的世纪就将降临世间。全世界的民族，不管多么僻远，多么落后，无不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甜头。苦头当然也是有的，毕竟是甜头为主。但是，我个人深切感觉到，在全球的芸芸众生中，究竟有几个人意识到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呢？在这一方面，人们大都是浑浑噩噩，“不识不知，顺辛之则”，连文化交流这个概念都完全是陌生的。

同世界历史上一些时代——也可以说是一切时代，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相比，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定，也谈不到友谊和团结。这种情况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再去描述。我在这里谈的是过去和现在，那么将来怎样呢？如果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去努力加以改变，则鉴古以知今，鉴今以知未来，人类在未来也不会得到安定，得到友谊，得到团结。

可是我偏偏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不管今天人类所处的境遇多么糟糕，也不管人间有多少是非，有朝一日——当然是在遥远渺茫的未来——人类终将共同进入大同之域。至于用什么形式，那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步，决不能空等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人们必须努力，张皇人类中的安定与友谊，和平与稳定。这种张皇不是诉之于宗教信仰，而是诉之于理智，这里面包括思辨与行动。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让人们从切身的感受中了解到，人类是互相依存的，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浑然一体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大道多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必拘泥。但是，我总认为，其中有一条阳关大道，这就是撰写文化交流史。从中国来说，就是撰写中外文化交流史。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不必空讲大而空的道理，而读者自然就能油然而生友谊与感情，团结与安定从而出现。难道这还不算是一条阳关大

道吗？

根据我这种肤浅的了解，我们这一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这一套丛书既有深切的学术意义，又有实用的现实意义，决非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

以上所论，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我虽是本丛书的主编，决不想强加于人。每一部的作者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至于材料翔实，立论谨严，实事求是，不尚炫耀，我相信每一位作者都能做到的，就不再啰嗦了。

是为序。

1993. 12. 20

前 言

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交流与传播在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个民族、地区、国家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封闭地、孤立地进行的，世界各个民族、地区、国家的文化必然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任何一个民族、地区、国家文化的发扬，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还必须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与此相联系，我们也从世界各国或地区吸收了不少文化精华，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界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给予了很大关注。其中，图书文献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图书记载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图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反映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面貌，它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标志。人们通过图书借鉴其他民族、地区、国家的先进经验，吸收其优秀成果，互相取长补短，图书是人类文化发展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图书文献的交流理应成为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系统地进行中外图书交流史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图书是记录人类社会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文献交流体系中最重要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我国图书进行国际交流的历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内国家之间的图书交流的历史

要更早一些。例如，中日之间，至少在3世纪之时，中国图书已传入日本，因为日本现存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纪》之“应神天皇”条载有百济国和迺古师贡上《论语》等文献之事（《日本书纪》记为“百济博士王仁”）。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按照严绍璦先生的说法，在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之前，中日之间还没有直接紧密的政治文化关系和贸易通道，因而，中日之间早期的文献典籍的交流是通过人种的交流来实现的，即图书传到日本主要是通过秦汉之际迁徙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

与早期中日之间以人种交流传播文献典籍的方式不一样，印度佛经是来华僧人带来的，他们来中国主要是传播教义。基督教文献的传入也同样如此。

早期文献的交流与传播受到交通的极大影响，无论是僧人来华还是中华僧人求经西天，都同样困难重重，以致演出文献交流与传播史上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由于交通阻塞的原故，基督教图书虽早在唐初即已传入中国，这有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证，但直到明末，基督教图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是时断时续。

图书通常是以文字、符号、声频、视频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写、刻、印、制等）记录有关的知识，这样，图书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后，熟悉这种语言文字符号的人就可以直接阅读，了解其内容，这只能是少数人，对当时大多数的人来说，必须借助翻译，通过阅读译本来了解原文内容。印度佛教典籍传入中国以后，通过翻译手段将梵本、胡文译成汉文，供多数人共享，这些佛典通过搜集、翻译、整理、流通等过程，成为我国早期中外图书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文献多为单向传播，从文献获取角度看，除了带来及求取方式外，也有文献掠夺方式，这种方式在元代四处用兵之际曾采用过。这种文献的单向传播除了受交通阻碍外，还有来自接受

者的障碍。总之，图书文献的交流与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到了明末，中外图书开始了互传，这是由于当时西洋传教士们带来了不少西书，他们一方面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一些，他们自己也编写（编译）了许多关于基督教教义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图书。与此同时，中国图书经这些传教士带到并介绍给法德等欧洲国家，这些图书在那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莱布尼茨之受《周易》影响，歌德之受《好逑传》影响等。尽管当时传教士们将西方科技图书带来并译介绍给中国是作为方便传教的一种手段，中国图书带至并介绍给西方还为数不多，且这次交流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毕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国与国之间图书双向交流的开始，这是真正的图书双向交流。

中外（主要是西方国家）图书交流广泛开展是从19世纪开始的。西方国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等为了了解西方，也开始搜集西方国家的图书资料，聘任了专门的英文译员进行翻译。洋务运动时期同文馆等的设立，为外国图书文献在中国的广泛交流与传播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外国的汉学研究也促进并加深了对中国图书的需求。正由于有了这种基础与需求，中外图书文献通过购买、赠送、劫掠等方式进行交流与传播。我国不少珍贵版本和稀见典籍是通过劫掠方式流向外国的。

中外图书交流史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于中国与某一国家图书交流的研究，例如，中日图书交流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有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严绍璁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宝平、韩锡铎主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中国图书在其他各国的流传，各国的汉学（中国学）给

予了一些零星的论述。但各国图书文献在中国的传播与交流的研究作得很不够,因为有些情况甚至连有关原始记录也不多。因而有关中外图书交流与传播问题,急需专门而系统的研究。

不过,已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不少可供借鉴的成果,对具体图书流传情况的分析而形成个案分析法,如王晓秋之研究《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对某一类或多类图书流传情况的研究,多采用书目分析法,如钱存训之探讨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还有文献分析法,多用于分析某种思想或思潮的传播。尽管中外图书交流缺乏整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说已比较成熟。

有鉴于此,当我们接受这一任务后,即不揣谫陋,率尔操觚。但抛砖引玉,藉此使得中外图书交流史的研究得到应有的重视,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本书是首次对中外图书交流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总结,由于图书交流的历史较长,有关资料不足,加之图书交流涉及的国家多,语种多,涉及的学科多,这就给研究者增添了许多困难。因此,本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盼各专家通人批评指正。

本书具体分工如下:

大纲由彭斐章、谢灼华拟定,前言由彭斐章撰写,第一、第二章由谢灼华编写,第三至第五章由胡先媛编写,第六、第七章由王心裁编写。全书由彭斐章组织编写。

目 录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季羨林(1)
--------------------	--------

前 言	(1)
-----------	-----

第一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图书交流	(1)
---------------------------	-----

第一节 佛教典籍的传入与翻译	(1)
----------------------	-----

一、佛教传入与佛教典籍翻译	(1)
---------------------	-----

二、佛教典籍的翻译分期与名家	(6)
----------------------	-----

三、图书交流的方式和影响	(14)
--------------------	------

第二节 中国图书流向国外	(19)
--------------------	------

第二章 隋唐时期中外图书交流	(22)
----------------------	------

第一节 佛典翻译与其他书籍的传入	(22)
------------------------	------

一、佛教典籍的翻译	(22)
-----------------	------

二、佛教典籍的纂集和注解	(30)
--------------------	------

三、佛教典籍的收藏与编目	(34)
--------------------	------

四、医学、天文历数书籍的传入与翻译	(41)
-------------------------	------

第二节 中国图书流向国外	(43)
--------------------	------

一、从《日本国见在书目》看中日图书交流	(46)
---------------------------	------

二、日本僧侣携带佛教经典归国	(50)
----------------------	------

三、中国图书在周边国家的流传	(56)
----------------------	------

第三章 宋元时期中外图书交流	(59)
第一节 汉文《大藏经》及其东传	(59)
一、《大藏经》的东传	(59)
二、高丽、日本刻印《大藏经》	(62)
第二节 域外汉籍及阿拉伯图书传入中国	(64)
一、高丽、日本的汉籍回传	(64)
二、元秘书监收藏的阿拉伯图书	(68)
第三节 中国图书流向国外	(70)
一、高丽的汉籍收藏	(70)
二、日本僧侣与汉籍东传	(75)
第四章 明代中外图书交流	(85)
第一节 西方图书的传入与翻译	(85)
一、耶稣会士在中国	(85)
二、利玛窦与西方图书的传入	(87)
三、南京教案与 7000 部西书	(97)
四、历局成立前后的译书活动	(102)
五、徐光启、李之藻的译书业绩	(109)
第二节 中国图书流向国外	(118)
一、李朝遣明使的活动	(118)
二、日本遣明使僧对汉籍的收集	(122)
三、安南使者求书与汉籍传播	(131)
第五章 清前期中外图书交流	(134)
第一节 西学图书的翻译	(134)
一、汤若望与清初历案	(135)
二、康熙与西学图书的传播	(137)
三、《律历渊源》及其他译书	(143)
第二节 从《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看西学传播	(151)
一、著译图书的学科类型及其分析	(153)

二、著译者及出版者分析·····	(158)
第三节 中国图书流向国外·····	(172)
一、汉籍的东传·····	(172)
二、汉籍西传及其翻译·····	(183)
第六章 晚清中外图书交流·····	(188)
第一节 西方图书的传入与翻译·····	(188)
一、西方印刷术与西书的早期传入·····	(188)
二、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大夫的编译活动·····	(196)
三、鸦片战争后的西书收藏与编译出版·····	(199)
四、清政府介入西书传播·····	(206)
五、格致书院与广学会·····	(216)
六、甲午战后开设藏书楼之议论与西书收藏·····	(219)
七、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对晚清西学书籍的总结、评 价与推荐·····	(223)
八、留日学潮与日籍的传入和翻译·····	(226)
九、清末西方图书的翻译·····	(236)
十、清末翻译图书的出版、印刷、装订与发行·····	(241)
十一、清末图书馆的兴起与外国图书收藏·····	(247)
第二节 汉籍外传及其翻译·····	(250)
一、汉籍外传·····	(250)
二、汉籍翻译·····	(263)
第七章 中华民国时期中外图书交流·····	(270)
第一节 外国图书的收藏、翻译与查禁·····	(270)
一、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图书馆的外国图书收藏 ·····	(270)
二、马克思主义图书在中国的早期传译·····	(277)
三、五四前后的其他翻译活动·····	(284)
四、五四后外国图书在中国的流传·····	(289)
五、1927~1937 年间外国图书的翻译与查禁 ·····	(295)

六、1937~1949年间外国图书的翻译与查禁	(302)
第二节 中国图书的外传与翻译	(308)
一、中国图书在欧洲各国的流传与翻译	(308)
二、中国图书在美国的流传与翻译	(314)
三、中国图书在日本的流传与翻译	(319)
第三节 中国图书的流失与寻访	(325)
一、中国图书的流失	(325)
二、国外访书	(335)
主要参考文献	(343)

第 一 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图书交流

第一节 佛教典籍的传入与翻译

一、佛教传人与佛教典籍翻译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由于封建王朝的封闭政策和交通的阻隔,加之图书载体笨重,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极少,所以,从秦至西汉,迄今尚无发现中外图书交流的事实。可以作为中外图书交流的开端的,应该是东汉之佛经传入。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境内,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宗教。佛教约于西汉末传入中国,文献记载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篇末裴松之注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闻、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经》,即佛经,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屡有信佛之事,并有汉明帝“遣中郎

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兰台石室第十四间”^①之说。明帝异母弟刘英信佛，崇奉浮屠，盛宴沙门、伊蒲塞，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②这些文献有些说法是应该存疑的，但有些佛教文献语言如浮屠经、伊蒲塞、沙门的通用和天竺僧人到中土的事实，至少说明在公元1世纪时，佛教传入中国，并已在统治阶级和贵族上层得以流传。汉末桓、灵之世，由于社会动乱，人们愈益需要佛教感情的慰藉，汉桓帝（公元147~168年）是一个好神权的皇帝，《后汉书》称其“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祀浮屠老子”。^③佛教既受提倡，佛典的翻译自然格外受到重视，西域各国印度、月氏、安息、康居高僧相继东来，在洛阳和汉族沙门、清信士合作，开始佛经汉译，揭开了中外图书交流的序幕。

印度佛教典籍传入中国以后，如果不把这些梵本、胡本通过翻译手段变成“秦言”、“晋言”，总之即汉文，那是无法在中土流传的。汉文经典，不仅僧侣要依据它宣传教义、传播佛法，并作为培养徒众的教材，而且就是一般信众，也迫切要求得到这些经典，得以默念诵读，希冀修成正果。可以说，僧众每日不可须臾离开的佛典，就是由中外僧侣合作，或中土僧侣独立完成，并通过抄写、装潢，一部部地出现在中土的，而这些佛典的收集、翻译、收藏、流通的过程，构成了早期中外图书交流史的重要部分。

撰于公元510~514年间的《出三藏记集》，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传播的文献集。该书编著者僧祐曾在序中说到：“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契万里，翻转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之受道，亦已阙

① 《牟子理惑论》，见僧祐《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② 《后汉书·楚王英传》。

③ 《后汉书·孝桓帝记》。

矣!”^①僧祐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佛典流传过程中,因不同之传本、不同的译者,或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以至政治影响,都会对佛典翻译、流传上造成影响。而翻译的发展,一般是由粗到精、由直译到意译、由外僧独译到中外合译,以至中土僧侣独译的过程。所以,佛教典籍的翻译牵涉面相当广泛。我们这里着重从图书交流的角度谈及翻译佛典,并非全面评价佛教典籍的翻译。这点需在这里加以说明。

宋赞宁撰《宋高僧传》有一篇《译经篇论》,对于佛教在中土翻译的发展作了概括,指出汉地译经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这相当于东汉初译经时的情况。“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相当于三国、西晋和东晋中期译经的情况。“后则猛(智猛)、显(法显)亲往,奘(玄奘)、空(不空)两通。”“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即东晋末至唐代译经时华梵皆通,文理俱精的情况。

汤用彤先生也曾指出:“然古时译经,仅由口授,译人类用胡言,笔受者译为汉言,笔之于纸。故笔受者须通胡语。”^②称“古时译经,或由记忆诵出,或有胡本可读,善诵读者,须於义理善巧,但不必即通华言。故出经者之外,类有传译者。”^③这实际上说明从汉到晋一段时期有一种背诵某种佛典者,旁有一人译成汉语,叫做“传言”、“度语”,再由“笔受”记载汉语于纸上成文的做法,当然也有直接由梵文宣译成汉文的翻译方式,这就是早期翻译佛典的一般情况。南北朝时,我国译经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翻译组织工作上也有了进步。如记载姚秦时鸠摩罗什译经情况时说:“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寰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又有校对

① 《中华大藏经·出三藏记集》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6、第69页。